漁獵採集
——香港沿海定居的史前先民生活模式

鄒興華

編者按：隨著香港史成為本港中學課程，以及本土認知熱潮，研究本港歷史成為一股風氣。但是，無論學者、教師或一般市民，對於本港在開埠以前的歷史，特別是史前時期的歷史，往往感到難以切實掌握。其中一項原因是由於有關本港開埠以前的史料頗為缺乏。本刊特邀請鄒興華先生撰文，詳細介紹本港近年的考古工作，並著重報導各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資料，期望可為研究本港歷史或教授本港歷史，提供入門的途徑，推動香港史的教學工作。

一、前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位於珠江口東岸，由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和離島（包括大小島嶼約三百個）組成，總面積達一千一百平方公里。據 2001 年統計，香港人口達 6,725,000 人，其中 95% 是華人，其餘 5% 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香港港口地理環境優良，水深港闊，可供很多遠洋輪船同時停舶， 2001 年港口共處理超過一千萬個貨櫃箱，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有多少人能想像，這個世界知名的維多利亞港，在一萬年以前，竟然連一點海水的影子也看不見；而在六千五百年前，香港境內仍然是渺無人煙。根據香港出土的文物顯示，大約在六千年前才開始有先民在境內活動，今天的香港，其實只是過去六千年歷史發展的沉澱。而在開頭的三千多年歲月裏，仍處於史前時期，先民主要以捕撈、打獵和採集為生，可謂天生天養。雖沒有農耕活動，不會積聚大量食物和財富，但先民已過著定居的安穩生活。本文主要根據近年香港考古發掘的資料，去闡述香港史前先民的歷史進程和生活模式，從而瞭解先民曾走過的艱苦道路。

二、古環境變化

據地質學家研究，地球年齡約四十五億年。而在最近的二百五十萬年內，地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包括氣候顯著變冷，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冰川活動（冰期），引致氣候帶遷移，海面升降，生物遷徙；另一方面是高等生物如被子植物和哺乳動物空前繁衍，地球上生機泱然，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演化，最終發展出高度的文明，成為地球的統治者。這不平凡的二百五十萬年，地質學者稱為「第四紀」，其中包括更新世（二百五十萬年至一萬年前）和全新世（一萬年前到現在）。考古學家則把更新世定為舊石器時代，全新世分為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歷史時代等。

第四紀最後一次冰期稱為「玉木冰期」，約於五萬年前開始，結束於一萬五千年前。冰期出現時，全球氣溫顯著下降，比現今的每年平均溫度約低 10℃左右，引致南北兩極的冰蓋和山地冰川擴張，最高峰時期，地球上陸地約四分之一面積為冰雪所覆蓋。由於高緯度的海水都結成冰，引致全球性的海面強烈下降，在約一萬八千年前的冰期高峰期，西太平洋海面平均下降約一百五十米，中國的渤海和黃海全部出露成為陸地，南海比今天縮小了約 20% ，成為一個半封閉的袋狀海灣，僅在東北方和東南方以狹窄海峽與太平洋相通[1]，今天的台灣島和海南島在當時是和亞洲大陸相連，當時的香港離海岸約有二百公里之遙。

約在一萬五千年前，冰期突然結束，全球氣溫迅速回暖，冰蓋和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在冰期鼎盛時出露成為陸地的大陸架又被海水淹浸，海浸的速度驚人，在五千年內，海平面上升了約一百一十米。距今約一萬年前的海面，僅比今天

低約三十多米。香港東南面的蒲台島、橫欄島、果洲群島一帶，就是當時的海岸線。到大約六千年前，海平面升至和今天海面相約的高度後才告穩定下來。在過去六千年，雖然海面位置仍有上下數米的波動，但海面變化基本穩定。

進入全新世後，全球氣候趨於暖和，其中約距今七千五百年至五千年這段時期，稱為「大西洋暖期」，氣候溫暖潮濕，年均溫度比現在高約2℃左右，因此這段時間又稱為氣候最適宜期。隨著溫暖的氣候帶和植物帶的北移，以往一些不宜耕種的土地亦變得適合於農耕，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範圍大大拓寬，由定居的農耕生活，帶來人口不斷繁衍，亦帶來財富的積聚，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轉變，最終在五千年前左右在幾處大河流域出現古代文明，如米索不達美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華夏文明，因此，大西洋暖期是人類發展史上一段極為重要的時期。香港地區亦在這時期內出現人類活動的證據，但香港和鄰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史前先民似乎安於漁獵採集的生活模式，文明的進程，遠遠落後於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農耕先民，下文將詳細論述香港的史前發展情況。

三、豐盛的環境資源

香港位於東經114.4度，北緯20.2度，屬南亞熱帶季風氣候，每年平均氣溫約22℃，年平均降雨量超過二千毫米，全年日照時間長而且無霜凍之害，加上高溫和多雨的季節配合，形成動物與植物資源十分豐富，植被面貌屬南亞熱帶落葉闊葉林和常綠闊葉林混交類型，據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鑽孔樣品進行的孢粉分析，過去一萬年來三角洲地區出現的南亞熱帶木本植物有：胡椒科、棕櫚科、栲屬、柞木屬、夜香樹屬、樟科、蒲桃屬、欖紅樹屬、桉屬、木麻黃屬、杜英屬、石柯屬、紅樹科、野牡丹科、常綠櫟、蕈樹屬、夾竹桃科、桃金娘科；並有中北亞熱帶及暖帶木本植物如：栗屬、櫟屬、桑科、金縷梅科、胡桃屬、榆屬、漆樹科等。[2] 反映出茂密的熱帶季雨林中，樹種繁多，果實累累，冬夏常青，有利於各種動物和鳥類生長。

根據清代靳文謨編纂的《新安縣志》其中〈地理志〉記載，在新安縣（包括今日香港）出產的果類有：桃、李柰、杏、栗、棗、梨、柿、柑、桔、橙、柚、橘、欖、蓮、椎、荔枝、圓眼、青梅、楊梅、楊桃、石榴、甘蔗、葡萄、黃皮、犀瓜、紅梅、金桔；蔬菜類有：芥菜、薑、葱、韮、莧、蒜、匏、瓠、竹筍、蕨、芋、茄、薯、菌、芥藍、白菜、油菜、茼蒿、蘿蔔菜、莙薘菜、波菜、苦藚、圓藚、圓荽、蕹菜、扶蘿菜、大葉菜、藤菜、生菜、苦瓜、金瓜、瓊芝菜、王瓜、節瓜、雪菜、冬瓜、菱荀、木耳、石髮、紫菜、油苔、蓴菜；豆類則有：紅豆、綠豆、黑豆、三收豆、白眉豆、扁豆、地豆、黃豆。[3] 雖然《新安縣志》記錄的這些蔬果、豆類植物，有部份是從外地移植，但絕大部份卻是從本地野生種屬馴養而變成人類日常的食用植物，可見本地區可供古代先民採集的植物資源非常豐富。

此外，《新安縣志》亦記載本地可見的毛類動物有：虎、豹、熊、豺、鹿、麋、猴、猿、山馬、獺、山豬、狐狸；鳥類則有：鷹、鶴、鸛、鷂、鶯、燕、鶻、鳧、鷗、鴉、翡、雁、雀、鶺鴒、鷺鶿、鷓鴣、白頭公、鴛鴦、畫眉、伯勞、鸚鵒、班鳩、鷦鷯、鶡雞、鬱雞、吉弔、竹雞、麻雀、杜鵑、鵪鶉、禾鵠、山鴶、紅裙、山鷓。[4] 上列這些飛禽走獸，很多都是現代廣府人喜歡食用的「野味」，這種食「野味」的習慣，其實是史前先民獵食動物的遺風。這亦反映本地可供狩獵的動物資源十分豐富。

位於南海之濱的香港，更有極為豐富的海洋資源，《新安縣志》記載在沿海或河湖能捕獲的魚類有：鯉、鰱、鱅、鯿、鯇、鯫、鰍、鰶、鱸、班魚、金魚、銀魚、塘虱、鮎魚、鱔魚、鱠鯝魚、沙魚、沉龍、虎魚、馬鮫、馬鱭、牛魚、雞谷、海豬、鸚歌、燕斗、馬母、鰭追、腰帶、刁甲、鯗魚、沙鱒、海牛、鯆魚、鯖魚、鮢魚、紅魚、鰽魚、黃雀、白春、石班、印魚、方魚、飛魚、黃皮頭、鋸魚、鰻魚、墨魚、橫擲、緧魚、河豚、鱮魚、章魚、鱲魚、金鼓、海哲、沙貼、鰛魚。而在沿海潮間帶能捕撈得到的甲殼類水產有：黿、鱉、龜、蟹、鱟、蠔、蜆、玳瑁、

龍蝦、銀蝦、海膽、蠔鏡、沙白、瓦屋、蜃灰螺、香螺、紅螺、沙螺、丫螺、馬夾柱、刁蛸螺、九孔螺、指甲螺、石頭螺、青口螺、鸚鵡螺、田螺、絲螺等。[5] 如此豐富的海洋資源，就是香港史前先民的主要食物來源。

四、史前沙堤遺址的生態環境

自一萬五千年前末次冰期結束，全球天氣回暖，冰川消融，大地逐漸回復生機。處於熱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的南海沿岸地區，由於食物資源豐富，應該吸引了很多先民在這裏生息。可是，由於海浸的關係，海岸線不斷向陸地推移，早期先民生活的濱海地區都被海水淹沒，直至約六千年前，海面上升至和現今海面相若的高度後才告穩定下來。從那時起，先民在濱海活動所遺留下的文化遺存，不再受海水淹沒，才有機會保存下來，並為今天的考古學者所發掘和研究。

考古學者在過去幾十年的調查和發掘，顯示香港現存有二百三十多處考古遺址，其中約六成遺址包含史前文化遺存。這些遺址集中分佈在沿海的沙灘和附近低矮的山崗、岬角，以及河流較平坦的谷地和河口階地。地點的主要特徵：一、有固定的淡水水源，二、有較平坦開闊的活動地方，三、附近環境能提供穩定而多樣化的食物資源，四、水陸路交通便捷以便不同聚落的往來。

在各式生態環境之中，香港史前先民主要集中在由海灣沙堤、瀉湖和紅樹林所組成的生態系統裏活動，過去三十多年在香港發掘的史前遺址，絕大部份都屬這類型，考古學者一般稱為「沙堤遺址」或「沙丘遺址」，包括南丫島大灣、深灣；長洲鯆魚灣；大嶼山萬角咀、大浪灣、東灣、白芒；馬灣東灣仔；屯門湧浪、龍鼓灣、掃管笏、下白泥；港島春坎灣。此外，屬於岬角類型的重要遺址有大嶼山扒頭鼓和沙螺灣岬角，屬於河口階地型的則有西貢蠔涌遺址。

由沙堤、瀉湖和紅樹林組成的生態環境十分獨特和充滿生機。海灣由於受到海角的保護，海浪的作用逐漸減弱而變為有建設性的微波，把物質不斷向岸方推移，因而在海灣內形成沙堤，沙堤背後往往形成瀉湖，附近溪澗的水通常經瀉湖而出海，因此瀉湖形成一個河口或鹹淡水混合的環境，一方面有陸上而來的物資沉積，另一方面又有漲潮而來的海洋物質，瀉湖內匯聚大量有機物質，泥土尤其肥沃，是紅樹林生長的最佳地方，林下泥土有各種軟體動物和甲殼動物，林上吸引多種禽鳥棲息。莫雅頓研究南丫島深灣遺址背後的古瀉湖，發現大量輭體動物的貝殼，並鑑定其中九種是腹足類，六種是蚌類。[6] 譚鳳儀和黃玉山研究了香港現存的四十四處紅樹林生態環境，發現紅樹林內生長的樹木有二十種，林下棲居的動物有一百種，其中輭體動物佔 70%，包括各式的螺、蛤、蠔、牡蠣、蜆；另外甲殼動物佔 26%，包括各種蝦和蟹。他們認為紅樹林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因為一些植物可供食用和餵飼生畜，一些更有藥用價值或可作漁網、皮革的染料，林木亦可作燃料之用。[7] 其實，除林木可供食用外，林中棲居的野獸和鳥類，以及林底的蝦、蟹、蠔、蜆等，更是人類的主要食物來源。

五、6000-5000 年前的香港

雖然從六千年前開始已有史前先民來到香港的濱海地區活動，但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似乎在早期的一千五百年內，在香港居住的人口仍十分稀少。能找到這時期先民的文化遺存的遺址只有：港島春坎灣；南丫島大灣、深灣、蘆鬚城；大嶼山大浪灣、東灣；赤鱲角虎地灣和過路灣；長洲西灣、屯門龍鼓灘和涌浪；以及銅鼓洲、沙洲等，這些遺址絕大部份都是典型的沙堤遺址類型，但遺址內出土的遺物卻十分零星，僅有一些陶器碎片和少量石製器具。陶器以拍印繩紋的夾砂陶為主，大部份都是炊煮用的釜和盛載食物的罐和盤；另發現一些製作頗為精美的泥質陶盤和豆等盛食器皿，器身或用赭紅顏料繪畫波浪紋，如春坎灣出土的彩陶盤和杯，或用尖狀物刻劃和戳印幾何圖案，更有刻劃紋和鏤孔組成的獸面形圖案在虎地灣的陶豆上出現，這些精緻的圖案，可能是先民的一種印記或徽號，同類的彩繪和刻劃紋圖案，在環珠江口的同時期的遺址中都有發現，可見先民活動範圍遍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

遺址出土的石器在數量和種類上都十分少，只有一些細小的磨製石錛、刀、鏃，或用海邊礫石打製而成的亞腰型網墜和三角形尖狀「牡蠣啄」，或直接拿礫石來使用的石錘、杵和砧等，這套工具，或可用來打獵，或可捕魚，或可挖掘蠔蜆，亦可對採集回來的食物進行加工；反映了先民的漁獵採集的生活模式。

不過，遺址出土的石製工具僅是先民使用過的部份工具而已，據人類學者對世界各地現存的很多狩獵採集土著部落的調查，發現他們多使到木和竹製做成的工具和器皿，可惜這些器具都容易腐朽，無法在遺址內保存下來。

關於早期先民的生活情況，深灣遺址 F 文化層提供了最豐富的訊息。在 F 文化層內曾發現幾個當時人類的活動面，面上零散分佈幾堆陶片和極少的礫石石器，另有幾堆礫石工具，和一個用三石塊砌成的凹形結構，可能是一處爐灶遺跡。F 層內亦發現了屬於二十個體的人類骸骨，有些伴出石器和陶器，應是墓葬遺跡，其中十三例人骨更出現火燒的痕跡，推測是屬於火葬，說明香港早期的先民，已有土葬和火葬兩種不同的葬禮風俗。[8] 此外，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志宏教授 (Brian Chisholm) 曾對 F 層人骨樣本進行碳十三同位素測定和古代食譜研究，發現當時先民的食物主要從陸地上獲取，只有小部份來自海洋[9]，顯示早期先民主要在深灣附近的山林進行狩獵和採集可食用的植物，至於捕撈海產的活動，僅屬輔助性的經濟模式。

六、4500 -3000 年前的香港

這段時期是史前香港的一段大發展期，人口比前一階段猛然增加，先民活動的足跡，幾乎遍及每一處海灣，且向高處的山崗和岬角及內陸的河谷階地進發，更出現較大型的聚落，顯示先民的社會組織已較為複雜。這時期重要的遺址包括湧浪、沙螺灣岬角、龍鼓灘、下白泥、東灣仔、蠔涌和掃管笏。

位於新界西部海岸的湧浪，是一處典型的海灣沙堤遺址， 1992-93 年考古學者在該地共發掘了約二千平方米[10]，發現了一處距今約四千五百年前的大型史前聚落。沙堤中部為生活區，其後靠近山坡處為居住區，南部則為墓葬區。在居住區內發現多個縱橫排列的柱洞，口徑一般在10 - 25 厘米，深 20 - 40 厘米，各洞間相距 2 – 5 米，雖然柱洞排列規律不清，但推測是干欄式建築的遺跡。生活區內出土的遺物和遺跡異常豐富，共發現多個爐灶遺跡，爐灶中間均為一圈石疊結構，圈外用泥加固，經火燒形成紅燒土，灶內有殘器座、爐箅、紅燒土板塊和大量木炭，應為灰燼的殘留。從灰燼層的厚度看來，當時先民主要是在沙灘上圍爐生火煮食物的。生活區的地面上散落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石器的種類繁多，工具有磨製的錛、斧、鑿、鑿、刀、鏃、矛和礫石加工的網墜、錨、鑽、錘、砧和礪石等；裝飾品有大量打磨和拋光精緻的環、玦和穿孔石飾等，顯示先民的石器加工技術較前期已大大提高，能因應各種環境和生活的需要，生產各式的工具，其中箭鏃和網墜的大量出土，反映先民仍主要以狩獵和捕撈為生。

當時先民所用的陶器，按質地仍可分為夾砂陶和泥質陶兩類，除釜、罐、盤、豆等各式炊煮和盛食器皿外，還出現了容積龐大的陶甕，推測當時在沙堤上聚居的先民，已有貯藏食物的習慣。陶器身上的紋飾較諸前期已有很大的改變，夾砂陶器除拍印繩紋外，還刻劃各樣的波浪紋；泥質陶器因燒製的火候較高而器身頗堅硬，並新出現拍印幾何紋如重圈紋、曲尺紋、葉脈紋等的裝飾風格，這種新出的幾何印紋陶器，在廣東北部的石峽遺址亦有發現[11]，廣東東部普寧虎頭埔遺址，更發現了十五處燒造這類器物的陶窯[12]，暗示湧浪出土的這類新陶器，可能是從別的地方交換回來的。

湧浪還出土了四件打磨拋光極為精細的石鉞，刃部沒有使用過的痕跡，推測不是實用的器物，很可能是聚落中重要人物權力象徵的一種禮器。由於石鉞在嶺南史前遺址中十分罕見，僅在粵北石峽遺址出土過同類石鉞[13]，不過，在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石鉞就十分普遍了，應該是這種石禮器的發源地。由此推測，湧浪石鉞很可能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而產生，中

間以石峽遺址為文化傳播的中轉站。如果這推測可以成立，則可說明史前的各個聚落絕不是處於隔離的狀態，而是交往頻繁，互通消息。

湧浪沙堤中部的生活區內，曾零星分佈幾座墓葬，而在沙堤南部，卻集中清理了二十座墓葬，應為當時的墓葬區。墓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多為南北向，人骨架已全部腐朽無存，每墓隨葬品簡單，多為一至兩件陶器，石玦一對，另一些墓隨葬石錛，石鐲和石墜飾等。[14] 由於墓葬區內墓向較為一致，排列有序，可證先民是長期在沙堤上生活。綜觀整個湧浪史前聚落分為居住區、生活區和墓葬區，佈局合理，秩序井然，說明當時已有較嚴密的社會機制，以管理聚落內先民的日常生活，但從墓葬極簡單的隨葬品來看，並未出現財富集中在個別人士的現象，顯示先民的地位仍相當平等，聚落內仍沒有階級分化的現象。

1993 年發掘的大嶼山沙螺灣岬角遺址[15]，年代大致跟湧浪相近，同屬約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岬角海拔高呈九十餘米，東、北、西三面環水，僅南面與陸地相連，其地理位置極富戰略性，和沙洲、銅鼓洲、赤鱲角隔海相望，在天朗氣清的日子，珠江口兩岸都可盡收眼底。在岬角頂部較平坦的約四百平方米範圍內，發現了一處可能是史前先民的營地，內有不少柱洞，最少是屬於兩座房屋結構的遺跡，另發現四座墓葬，隨葬品跟湧浪遺址相似，僅有一至二件陶器及一至三件石器。此外，遺址的一些洞坑內更發現九件完整的陶罐和十二件完整的磨製石錛，懷疑是屬於祭祀坑一類的遺跡；另一些洞坑可能是開鑿石英礦時所遺留的。在遺址地面上散落的遺物，除大量的陶器碎片及紅燒土外，更有陶紡輪、礪石、石網墜、石錘、石砧、石鏃、石矛、石錛，以及經拋光處理的石環等。這套工具顯示先民以採集漁獵經濟為主，沙螺灣岬角史前營地的發現，說明四千五百年前本地先民的活動範圍，已從海邊沙灘擴展至較高的山崗岬角上了。

大約距今四千至三千年間，可說是香港歷史上等一次人口大爆炸期。幾乎每一處海灣都可找到這段時期的文化遺存。在 1997-98 年的全港考古普查中，就在新界西部后海灣南岸發現了一系列屬於這時期的遺址群，從北向南包括輞井、流浮山、坑口村、沙江廟、沙江村、鰲磡石、虎地凹、上白泥、浪濯村、下白泥、稔灣，加上湧浪、龍鼓上灘、龍鼓灘，以及對岸的銅鼓洲、沙洲，都有豐富的文化遺存[16]，好些遺址如上白泥、下白泥、龍鼓灘和龍鼓上灘，面積均超過一萬平方米，是大型的史前聚落，是瞭解香港史前歷史的資料寶庫。近年的調查中，亦在大埔林村河谷階地和元朗錦田河谷北岸古海灣沙堤裏發現這時期的文化遺存。上述遺址群的發現，大大拓寬了我們對香港史前先民的認識。

香港考古學會區家發和莫稚曾對上白泥和下白泥遺址進行試掘，出土的遺存令人耳目一新。1997 年在下白泥遺址中部發掘面積共計 131.46 平方米，最主要的收獲是發現了兩座相毗連的史前夯土房基，其中一座完整保存。另一座僅清理揭露了小部份。保存完整的一座房基，由五十一個排列整齊的柱洞所組成，呈長方形，座向為正東西向。東面背靠山，西面臨海，房基南北面寬 12.5 、東西進深 8.5 米，面積達 107.5 米。據發掘者復原，這是一座面闊六間、進深兩間、前面出廊的長方形懸山頂式大房子，門道在西牆較南處，寬 1.8 米，為兩扇對開的大門。門道外有門蓬。估計整座房子是用竹、木、茅草、或樹皮架搭而成。[17] 如此大型的史前房基的發現，在華南沿海沙堤遺址中尚屬首例。由於下白泥遺址面積達二萬平方米，這座寬大的房子，推測是整個聚落裏的一所公共活動的場所，僅是建築群的一部份而已。

1999 年在上白泥遺址的試掘，共清理一百多平方米。在四千年前的文化層裏發現了三座陶窯和一處製作加工玉石器的地點。[18] 三座陶窯自西南向東北呈直線排列，間距約三至四米，其中一座為平頂橫穴窯，兩座為平頂豎穴窯，由於窯室內還原焰的作用，陶器火候較高，呈灰黑色。玉石器製作地點內發現有打片剝落痕跡的石英岩巨型石核、大小不同的球形石錘、滿佈磨痕的礪石，石英碎片四百多片，半成品的石英環胚和水晶片多件，成品則有環、玦、璧、錛等，顯示了

生產磨光石器的完整流程。上白泥試掘中出土的陶窯和玉石器加工點，可推斷這遺址裏有一個相當規模的陶器和玉石器製作工場，當時在沙堤上定居的先民，很可能已發展出原始的手工業，其產品不僅供自己使用，有部份更可能是和別的聚落先民進行交換或貿易。

關於石器製作加工地點方面，1999 年西貢蠔涌遺址的發掘亦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遺址位於蠔涌河口南岸的階地上，在海拔四至六米之間為河礫石分佈地帶，這些不同岩性的大小礫石，是先民製造石器的上佳材料，在遺址中部一處約二百平方米的範圍內，出土了大量石器的成品、半成品和廢品，其中約五十件是一種用礫石打製，俗稱「蠔蠣啄」的尖狀石器，推測是先民用來打開蠔、蜆一類硬殼的工具。[19] 蠔涌石器製作加工地點的發現，顯示先民已有分工的現象，這亦是部落逐漸擴大，經濟生產部門逐漸分流的必然結果。

1997 年在馬灣島東北岸的東灣仔遺址發掘中，共清理了二十座史前墓葬，大部份還保存了人類骸骨，雖然骨質保存很差，但經專家仔細的修補，仍能復原部份骨骼，並可進行體質人類學的鑒定和測量，對研究香港史前先民的族屬和生活習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是香港史前考古史上的大突破。[20] 在 1997 年東灣仔北部沙堤的全面發掘，共清理了一千四百平方米，證明當地是一處史前墓葬區，二十座墓葬的排列有規律，絕大部份是南北向，大體與沙堤的走向平行，各墓之間的距離約在四至五米左右，其中三座更是二次葬，說明東灣仔北沙堤是在馬灣上長期生活的先民所特選的一片墓地。各墓葬中，除兩座外，皆有隨葬品。其中八座只隨葬石器，五座只隨葬陶品，另四座隨葬陶、石、骨器。各墓隨葬品多寡不一，一般二至三件，最多者達九件。隨葬陶器皆為日用品如釜、罐、缽等；石器有錛、蠔蠣啄、砍砸器等工具，和環、玦、唇飾等飾物；另有魚骨飾、虎斑寶貝和貝殼等。與深灣和湧浪史前墓葬比較，無論在墓葬的形式，以至隨葬品的數量和質量上，都未有明顯的變化，可見香港史前先民的文化發展比較緩慢。

韓康信教授曾對東灣仔墓葬出土的十五個人骨標本進行測量和鑒定。[21] 有九個可鑒定性別，分別是男性七個，女性兩個。死者年齡方面，最小的只有幾個月大，最年長的超過四十歲，而死亡年齡不超過十歲的就有六個，佔總體人骨標本的 40%，說明當時兒童的夭折率十分高。綜觀東灣仔人骨的主要特徵是：長而狹的顱形、配合有高顱性質、眉弓和眉間突度發育適度、額部較豐滿、低眶、低面、闊鼻、齒槽突頜、鏟形門齒。體形較矮、平均身高為 162.8 厘米。這些形態特點，明顯是屬於蒙古人種（即黃種人），但較黃河流域古代居民更富有類似熱帶種族的一些性質。因此，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來說，香港史前先民肯定是屬於蒙古人種，而且和鄰近華南地區如佛山河宕遺址和福建曇石山遺址的先民十分相似，同屬蒙古人南亞種，但和華北中原地區的先民比較就有較多的分別了。

東灣仔先民流行的拔牙風俗尤為值得注意。在東灣仔的人骨標本中發現了兩例拔牙現象，其中一為女性，拔去了一對上頜中門齒，另一為男性，拔去上頜右側第一門齒，從齒槽的閉合程度推測，拔牙的年齡在十五至十七歲之間，故推測是拔牙風俗的遺留。我國拔牙風俗最早見於山東和江蘇北部一帶、六千五百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先民，之後，約六千年前的馬家濱文化、五千年前的崧澤文化、四千五百年前的屈家嶺文化，都有拔牙的例子。大約四千年前，拔牙風俗傳播到華南沿海地區，福建曇石山墓葬就發現了一例，佛山河宕墓葬更發現了十九例之多，可知拔牙風俗一直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史前文化中流行，而東灣仔兩例，更是我國史前考古中緯度最低的拔牙証據。此外，拔牙風俗更可能隨著南島語系先民從華南沿海地區向台灣、菲律賓，以至太平洋諸群島擴散，因而流行於南太平洋海島上的土著民族之中。[22]

加拿大志宏教授亦對東灣仔十三個人骨標本進行碳十三和氮十五穩定同位素分析，以確定先民的食物來源，結果顯示，東灣仔先民約 85% 的食物是來自海洋，另外 15% 是來自陸上，這和深灣遺址先民食譜研究的結果剛好相反。志宏教授

推測是與遺址的地理環境有關，因為深灣所處的南丫島面積較大，從陸上可採集的植物和狩獵的動物很多，故先民的食物多從陸上採集和狩獵而來；相反，馬灣島的面積細小，陸上食物不多，先民於是集中進行捕撈魚、蝦、蟹、蠔、蜆等海產。[23] 其實，這亦可能跟捕撈的技術進步有關連，從早期遺址如深灣和大灣等少量網墜，到後期的湧浪和沙螺灣的大量亞腰型石網墜、石錨，以至蠔涌、東灣仔的蠔蠣啄都顯示先民的捕撈技術不斷進步，從大海和瀉湖所獲得的食物不斷增加，成為先民的主要食物來源。

大約在距今三千多年前，香港地區的先民已掌握了鑄造青銅器的技術，並在香港鑄造青銅工具。南丫島沙埔村曾發現一處青銅鑄煉遺址，出土四件鑄造青銅斧的石範盛載銅液的陶坩堝，以及鑄銅器時留下的銅渣。[24] 此外，過路灣、沙螺灣和東灣仔亦出土過鑄造銅斧的石範。但香港境內出土的銅器不多，而且種類簡單，只有扁莖短劍、鑿、篾刀、扇形斧、魚鈎、鏃、矛、戈等工具和武器，不見中原地區的重型青銅禮器如鼎、簋、編鐘等，可推斷香港仍未受到中原文明的直接影響。[25] 不過，間接的影響就很大，南丫島大灣出土的商代石牙璋和石管飾[26]，沙洲[27] 和東灣仔[28] 出土的石戈，以至蟹地灣[29] 和東灣仔[30] 出土的褐釉陶器，都有商文化的影子，說明香港先民和內陸先民交流頻繁，流風所及，中原商代的文化就流播至南海之濱的香港。可是，帶來的影響似只限於物質文化，北方先進的農耕經濟、社會制度仍沒有影響沿海的先民，他們仍以漁獵採集經濟為主，社會組織簡單，並沒有農業經濟的證據。這種文化發展緩慢的現象，環境的因素至為重要，如前文所述，香港處於南亞熱帶地區，陸上動植物資源極為豐富，加上海洋豐厚的資源，先民靠狩獵採集和捕撈，已可以獲得足夠的食物，可過著較為安逸的定居生活，更有空餘時間去改進生產陶器和石器的技術，發展出原始的手工業，以產品來和別的群族進行交換。因此，先民根本沒有必要投入大量勞動力去開墾耕地和進行耕種以生產食物。這種天生天養、自給自足的生活，由於缺乏壓力和競爭，難以促進文化向前發展。直至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大軍南下統一嶺南，才帶來這地區翻天覆地的轉變。

七、結語

我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先民，約於一萬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已開始農業革命，不再靠狩獵和採集的方式去獲取食物，而是以自己的勞動力去生產所需的食物從而形成定居的生活，財富的逐漸積聚，人口的快速增長，社會階層的分化，因而促成文化的飛躍發展，到距今五千至四千年前，已發展出極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如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和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終於四千年前，在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出現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皇朝——夏朝。在其後的一千年裏，更先後經歷商朝和周朝的更替。

相比之下，中國南方的珠江流域，尤其是東南亞沿海地區的史前先民的文化發展就顯得緩慢，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與較優良的自然環境條件有關。因為南方氣候和暖，雨量充沛，動植物繁茂生長，先民很容易便能在山林裏採集到各類可食用的植物，或捕獵猴、鹿、山豬等動物充饑，沿海先民更有極豐富的海洋食物資源，因此，長久以來先民都是過著漁獵、捕撈和採集的生活。正由於豐盛的自然資源，先民就缺乏改善生活，改變環境的動力，以致文化發展遠遠落後於北方的中原文化。

情況一直發展到近代才起變化，中國這個一向以農為本的東方農業大國，竟在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在被迫簽下屈辱的南京條約和割讓香港之後，才驚覺到古老的中華文明，已遠遠落後於由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為主體的西方現代文明，中國從那時起才開始改革，要追上先進的西方文明，但這改革的道路竟如此艱苦和漫長，直到今天還未成功；而香港這個細小的西方殖民地，卻在西方的物質、制度、精神文明的全體移植之下，竟在一百五十年間一躍而成一個全盤西化的國際大都會，「1997 年回歸」後更成為中國最先進的城市，回顧這六千年來香港歷史的發展，由文化落後的史前聚落而至今天的商貿大都會，可是歷史的偶然？

註釋：

[1] 黃慰文、侯亞梅：〈關於東亞早期人類生態環境的重建〉,《第四紀研究》, 1999年第2期, 頁155-164。

[2] 李平日、喬彭年、鄭洪漢、方國祥、黃光慶：《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1年), 頁1-17。

[3] 馬金科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1998年), 頁678。

[4] 同註3, 頁679。

[5] 同註3, 頁679-680。

[6] 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考古學會, 1978年), 頁44-50。

[7] Tam, F. Y.; Wong, Y. S., *Hong Kong Mangroves*, Hong Kong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0.

[8] 同註6, 頁105-110, 232-245。

[9] Meacham, W., "Recent Research On C-14 Dating and C-13/12 Ratios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XII, 1990, pp.173-176.

[10]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湧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 1997 第 6 期, 頁 35-53。

[11]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 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2001年), 頁24-63。

[12] 楊少祥等：〈廣東普寧虎頭埔古窯發掘簡報〉, 《文物》, 1984年12期。

[13]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 《文物》, 1978年7期。

[14] Meacham, W.,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at Yung Long South." 載楊春棠、李惠玲編：《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1995年), 頁445-446。

[15] Drewett, P.L., *Neolithic Sha Lo Wan*. Antiquities & Monuments Office Occasional Paper No. 2, 1995.

[16] 鄒興華、蕭麗娟：「全港考古遺址及歷史建築調查簡報」, （文物與旅遊國際研討會論文, 1999年, 未刊稿）

[17] 香港考古學會：〈香港元朗下白泥吳家園沙丘遺址的發掘〉, 《考古》, 1999年第6期, 頁26-42。

[18] 區家發、莫稚：〈香港陶日、月形禮器的首次發現及其意義 – 兼談陳家園遺址的考古收獲〉, 載英德市博物館等編：《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 頁441-446。

[19] 鄒興華：〈香港西貢蠔涌搶救發掘收獲豐富〉, 《中國文物報》, 1999年7月25日。

[20]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史前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 1999年第6期, 頁1-17。

[21] 韓康信、董新林：〈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史前遺址出土人骨鑒定〉,《考古》, 1999年第6期, 頁18-25。

[22] 鄒興華：〈論香港東灣仔北遺址史前墓葬的考古學意義〉, 載《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 頁449-469。

[23] Chisholm, B., "Prehistoric Diet at the Ma Wan Site, Hong Kong: Stable Isotopic Evidence." 2001 (Unpublished paper)

[24] Meacham, W., "Sha Po Tsue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XIII, 1993, pp. 33-54.

[25] 鄒興華：〈論香港及鄰近地區出土鑄銅石範〉, 載銅鼓和青銅文化的再探索編輯組編：《銅鼓和青銅文化的再探索－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古代銅鼓和青銅文化第三次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缺出版地資料：民族藝術雜誌社, 1997年), 頁139-146。

[26] 區家發等：〈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簡報〉, 載鄧聰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4年), 頁195-208。

[27] Frost, R. J., "Sha Chau."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VI, 1976, pp. 37-50.

[28] Rogers, P.R., et al, *Tung Wan Tsai: A Bronze Age and Han Period Coastal Sit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ccasional Paper No. 3, 1995.

[29] Williams, B.V., "Hai Dei Wa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 VIII, 1980, pp. 27-51.

[30] 同註20。